

主持人语

近年来，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对这一海域油气资源争夺的加剧。今年8月以来，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油气资源勘探活动再次使希土关系进入紧张状态，加剧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复杂化。本次工作坊邀请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多学科学者，从多角度讨论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希腊关系，并希望通过世界文明史、世界秩序、国际规则等视角的跨学科对话，深化我们对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多维度认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晓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史前与古代时期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密切的人口、文化交往和政权更迭，指出希腊和小亚细亚地理上的相互毗邻造成了两地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但海洋的阻隔又造成了两地之间在政治上的分立与冲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从自古希腊时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视角探讨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国家战略。他认为，关于东地中海的一些利益争夺可能是暂时的，更需要关心的是未来30-50年或者更长远时段的文明发展意义上整个欧洲和土耳其会发生何种态势的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李建军同样从东西方的视角考察了希土之间的争端。土耳其“既东且西”的模糊状态使之成为西方必须谨慎对待的因素。西方孤立土耳其并不可取，土耳其继续挑衅也不可取，明智做法是双方采取中介对话进行谈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分析了希土冲突的原因。他认为，近期双方上演的种种争端是油气资源争夺、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政治分歧引发阵营对立等多重矛盾叠加共振的结果，大国和国际组织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的复杂性。因此，短期内希土争端仍将持续，核心分歧难以解决，暴发军事摩擦的风险依然存在。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廖雪霞从国际法的依据及双方在国际法的立场角度分析了希土争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沿海国权利范围内容是否适用于土耳其，是判断希腊与土耳其海洋权利内容的根本问题，两国在这些权利的具体立场上差异太大，也使得爱琴海争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她认为，由于土耳其对法律解决一直持反对态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两国争端的可能性不大，而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有可能发挥有效作用。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的 Elena AVRAMIDOU 认为，在地中海东部最近发现气田之后，希土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些发现揭露了古老的纠纷和主张，未解决的问题和民族主义分歧。鉴于其他国家（塞浦路斯、法国、利比亚、埃及、阿联酋、美国）和组织（欧盟和北约）的介入和不同的利益考量，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修正主义强硬外交政策使其与希腊的关系更加紧张，局势更加复杂和困难。

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颖超从能源博弈的角度分析希土两国关系。她认为，东地中海能源问题究其根本，与塞浦路斯问题及希土领海争议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分析了影响希腊民族认同的西欧思潮：希腊主义和亲希腊主义，并从 19 世纪希腊教科书的编撰出发，指出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写作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希腊中心主义，强化了希腊人虚假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种不切实际的民族自信心又反过来对希腊的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其最典型的灾难后果就是希腊在 1897 年希土战争中的惨败。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龚颖元以近一个月来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为切入点，梳理了土耳其政府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以及如何将其行为合理化的具体路径。阿通社试图塑造一个积极争取舆论声援的政府形象，但无论是大声疾呼两点主张，还是旧事重提老生常谈，都较突出地反映了土耳其政府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问题。在国际力量的干预下，东地中海问题最终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

土耳其和希腊关系是影响地中海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近期两国围绕东地中海能源资源的争夺是两国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争端的集中体现与再次凸显，其中也蕴含了大国博弈的色彩。土耳其和希腊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从多维度、多学科视角深化对两国关系和国情的认识，对于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平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意义。

咎 涛

2020 年 10 月 9 日

“博雅德信工作坊”第 37 工作间

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希腊

2020 年 9 月 29 日

因东地中海划界和油气资源等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近来紧张关系加剧。从年初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冲突到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身份变更的争执，再到当前“油气勘探危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已经从开始的口水战逐步升级到现在的军事对峙，整个地中海区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此次工作坊邀请到包括研究古希腊历史和近现代希腊历史，以及研究希腊和土耳其现状的学者，共同围绕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希腊关系进行学术交流与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晓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史前与古代时期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密切的人口、文化交往和政权更迭。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经历了约 2000 年的短暂的中石器时代，其文化与旧石器时代和之后新石器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丰富，中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岸和近海地带，因为它呈一种海洋特征。对此影响较大的解释是这一文化近海并具有海洋性，所以应该是由海路来的，而不是由陆路移民带入的，并且这个移民方向被认为来自安那托利亚或更远的东方。比较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解释，比如基克拉迪群岛遗址 Maroulas 遗址。这里

的文化和近东各文化都没有关系，且经研究发现它的文化应该来自于希腊大陆，即这种海洋性特征可能是原有旧石器时代海洋传统的一种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可能不显著，而在这个时期比较显著，当地人口来自于希腊大陆本身。和近东的相似性有可能是大陆带到小亚细亚去，或者是带到更远的塞浦路斯去的。实际上，无论是哪种解释都表明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在中石器时代有人员和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

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源于近东和西亚并向外传播。这个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其西边出现了一个分叉，这就是小亚细亚的东南部地区。希腊的新石器时代也分若干地域类型和几个阶段，比如色萨利地区、东南希腊、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等，它们都呈现出各自不同文化类型。

青铜时代整个爱琴海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可以分成四个地域类型，即希腊大陆、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北爱琴海和西安那托利亚。青铜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期以及 12 种文化类型。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认为，希腊大陆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于小亚细亚，而且与小亚细亚西部和整片爱琴海地区构成一个语言和文化上共同体。这项研究由考古学家卡尔·布里根邀请语言学家哈雷共同进行，他们绘制了一个希腊大陆前希腊语地名的地图，并根据地图比对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上寻找到一个与这种共同的语言及其所反映的共同文化相吻合的时期。他据此得出结论：早期青铜时代，所有的四种地域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一致的，构成一种共同文化，因此前希腊语属于这个时期。中期希腊开始，各地文化不同，有一些新的陶器类型以及其他一些附带的文化特征

进来了，这被认为是最早的希腊人到来了。

黑暗时代有三支希腊人队伍向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区移民，造成了语言上跟大陆的平行关系，也就是希腊几种方言呈纬度分布。到了殖民时期，整个环小亚细亚地区都处在希腊人的影响之下。希波战争时期，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首先暴动。波斯人无论走北边还是中部，都是以小亚细亚为基地，希腊人抵御波斯的重要海战也多发生于小亚细亚海岸。雅典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除了希腊城邦之外还有非希腊人，他们都被纳入到帝国之内缴纳贡金。因为接触较早，所以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小亚细亚地区实际上已经希腊化了。由于希腊化比较彻底，罗马时代有两个皇帝建设的泛希腊同盟当中，有不少都是小亚细亚的这种希腊化的非希腊城市，如吕基亚、吕底亚、卡里亚等等。

徐晓旭总结称，史前时代以来小亚细亚与希腊有着持续且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影响可能来自任何一方，由小亚细亚到希腊，或由希腊到小亚细亚。希腊和小亚细亚地理上的相互毗邻造成了两地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但海洋的阻隔又造成了两地之间在政治上的分立与冲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从古希腊时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视角探讨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国家战略。他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文明视角谈世界秩序的学者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界定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几个国家是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位列其中是因为它始终摇摆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此外，亨廷顿对于整个伊斯兰文明还有一个判

断，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承担。与西方文明有欧美，中国文明有中国不同，伊斯兰文明始终缺乏能够担当起文明形态的核心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同样是处于伊斯兰文明之下无所适从的国家。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土耳其似乎又最能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潜在担当者。

从文明史视角看，从史前一直到古典时期，整个爱琴海区域的希腊和小亚细亚，乃至整个地中海区域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文明往来，甚至有非常直接的政治性往来。到了古典时期，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希波战争。波斯占领整个小亚细亚之后，与希腊世界产生直接的武力冲突和军事冲突，直接原因在于小亚细亚与爱琴海沿岸城邦要反叛波斯统治，并寻求希腊城邦雅典的帮助。随后掀起的伊奥尼亚的反叛引起波斯的不满，并攻打雅典。古典时期，波斯对于整个希腊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影响着整个希腊地区的国际秩序。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一方面记载了整个希腊世界，另一方面也记载了大量后来被称之为蛮族的非希腊世界。其实在希罗多德那里，非希腊族人叫做非希腊人或者异族更合适一些，他并没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像后人那样对蛮族在文明等级上的歧视。

张新刚指出，公元前5世纪之后，特别是4世纪时，希腊关于东方的讨论逐渐把东方蛮族化。从最早对希波战争的描述，到后来雅典人通过各种题材，包括喜剧、哲学、历史等文本，慢慢树立起这样一种形象：东方是专制、野蛮的，理性能力不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只有希腊人才是天选之子，有理性，性情也比较适中，能够发展成健

全的人性，从而产生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政治和专制的冲突。而这样一种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或文明对抗的范式，对后来的历史认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的东西对立也在延续文明对野蛮，政治对专制等一些话语体系。

希腊后来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转变为罗马帝国，后来又被土耳其取代。19 世纪希腊的一些政治家还想建立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基础的大希腊国家，将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这被称为“伟大理想”（Megali Idea）。今天看来这个战略很难实现。与之相对，土耳其人也有一个奥斯曼帝国梦。如果沿着历史演变的途径，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实，即今天在思考土耳其处于东西之间这样一种状态或者地缘政治态势时，不难发现，希腊和土耳其都在自身的历史传统之中，历史也影响着双方的关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极力想要加入欧盟，希腊则是最坚定地反对者。虽然两国都是北约成员，但二者仍能够体现出自希波战争以来的文明对抗，只是这种对抗在当下呈现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

回到当下文明态势的发展看，一方面土耳其已基本上放弃寻求成为欧盟一员，同时欧盟自身也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土耳其开始努力去构建一种以突厥认同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或是更具雄心的想象，埃尔多安似乎也在将自己打造成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领导人，这是亨廷顿之后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面对这样一种态势，原来西方文明的担当者逐步转向了美国，欧洲如何在政治上成为新的担当者，目前看态势并不明朗。对于东进的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直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

张新刚认为，有着 8000 多万人口的土耳其更有可能成为某种文明的担当或载体，毕竟土耳其有着庞大的人口和稳定的政治组织，以及一个西方化的经济发展基底结构。土耳其能否不再无所适从，从而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担当者，值得长期观察。从文明的意义上看，土耳其的伟大复兴梦的确有非常扎实的人口、地理位置以及越来越一体化的宗教文化认同基础。当然，西方作为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传统文明，它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调整能力以及未来发展的韧性是不可小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地中海出现的利益争夺可能是暂时的，未来 30-50 年或者更长时期内整个欧洲和土耳其在文明发展层面会发生何种态势的变化更值得关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分析了希土冲突的原因。首先，油气资源之争是引发冲突的最直接原因。过去十年，东地中海周边各国接二连三发现天然气，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该地区可供开采的石油约 17 亿桶、天然气约 122 万亿立方英尺。大量的油气储备引发周边国家激烈争夺。

2019 年 1 月，埃及集结东地中海周边 7 国出台“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纲领，希望成为东地中海出口天然气的主要能源中心。同年 3 月，包括埃尼，埃克森美孚，希腊石油，诺贝尔能源和道达尔在内的主要油气公司的高管聚集在塞浦路斯，研讨塞浦路斯如何发挥其作为石油和天然气服务中心的潜力，探讨相关的优势和挑战，并提出建设这个岛屿国家油气能源行业的战略规划。

土耳其不甘落后，一直想依托优势地理位置，将土耳其

打造为“欧亚能源走廊”乃至“世界能源中枢”。早在 2006 年，土政府就推出了“蓝色家园”（Blue Homeland）概念，在地中海地区划定 18.9 万平方公里领海，远超其实际控制的面积。2019 年 2 月初，土宣布东地中海开采计划，5 月 3 日再次披露方案细节。同时，土耳其还不惜动用武力保驾护航。2019 年 3 月，土海军出动 103 艘军舰，在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同时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其中包括与希腊有争议的地区。

2019 年 12 月，土耳其与利比亚西部政府达成协议，确定了一条长达 18.6 海里的线路，作为分隔两个经济区域的海上边界。埃尔多安表示，这项协议将允许进行联合勘探活动，但是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却认为，这项协议是土耳其企图占领东地中海地区的表现。希腊方面认为，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的协议，无视希腊诸岛在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权利，这可能会影响计划建设的“East Med”管道。

2020 年 1 月，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就“East Med”管道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是一条总长 1900 公里的海底管道，希望通过希腊和意大利将东地中海的气田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同年 8 月 6 日，希腊和埃及签署了一项海上协议，将两国之间的大片水域划分为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对此强烈不满。8 月 10 日，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伊斯（Oruc Reis）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钻探天然气，希腊与土耳其紧张关系升级。8 月 12 日，一艘希腊军舰在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之间海域执行任务时，与一艘土耳其军舰对峙，险些相撞，冲突达到顶峰。8 月 25 日，希土两国在东地中海同时举行军演。8

月 30 日土耳其胜利日之际，埃尔多安将当前与希腊等国的争端等同于百年前列强达成的《色佛尔条约》。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是导致争端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主权之争。塞浦路斯岛在东地中海能源地图上位置重要，但其自 1974 年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塞浦路斯受希腊支持，是欧盟成员；北塞浦路斯仅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被视为土的“卫星国”。土一贯主张北塞应享有完整主权，与南塞平分海洋资源，实质是要求分割希腊和南塞的海上利益。因此，2018 年塞浦路斯准备开发天然气时，土耳其随即派出战舰阻止埃尼公司作业。土耳其方面表示，不会允许塞浦路斯在未与土耳其塞族人达成收入分配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开采天然气资源。另一方面是海洋划界之争。地中海是半封闭海域，东部沿岸国家密集、岛屿众多、文化差异大，各国对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认定互有重叠，划界不明是历史遗留问题，油气大发现使之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土耳其海岸线虽长，但因被希腊众岛及塞浦路斯大岛近距离包围，海上领土主张受限最多，要求重新划界的呼声也最强烈。

第三，地缘政治分歧引发阵营对立。土耳其与希腊长期不睦，近年来又因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先后开罪以、埃、沙特、阿联酋等国，因而在东地中海备受孤立。7 个国家抛开土耳其，单独成立了东地中海论坛。为冲破困局，土加大了对利比亚的军事投入，与利比亚西部政府签订协议，重划专属经济区，扩大海上管辖权。但这样做不仅直接挑战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三国海洋边界，而且威胁到埃及、阿联酋、法国、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进一步将东地中海问题与利

比亚内战捆绑在一起，加剧了争端的复杂程度。

大国的介入令问题进一步复杂。东地中海油气争端牵动多方利益，美、欧、俄等大国立场不尽相同，这也成为矛盾迟迟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态度暧昧。**从经济利益看，美欲在东地中海分一杯羹，其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诺贝尔能源公司已加入塞浦路斯、以色列等国的勘探作业，对土欲搅局、谋求扩大海洋权利范围的行为不满；从战略利益看，土、以、埃、希均是美盟友，且土、希同为北约成员，同室操戈势必削弱美主导的同盟体系。因此，美虽暗中支持希、塞，明里却要调解、安抚，同时参加土、希双方的海空军事演习，但却逐步解除了对南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借此制衡土耳其的意图明显。**欧洲进退两难。**一方面有支持希、塞的冲动，不仅因为两国是欧盟正式成员，更重要的是，两国能源计划有助于促成欧洲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加上近年土欧关系持续走低，双方价值观背离，欧亦有遏制土向东地中海扩张的战略需求。但另一方面，欧盟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受制于土，亦担心向土过度施压会将其推向俄罗斯的怀抱，因此又必须保留与土对话和谈判、协调的空间。两难选择催生欧盟内部分歧，希、塞与土已进入零和博弈，不肯后退。俄在利比亚与埃及、法国等立场相近，但在阻止希、塞、以修建海底管道问题上与土有共同利益，因此未肯轻易表态。事实上，考虑到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占比约 37%），未来东地中海维持危机状态，希、土持续对抗，导致资源开发受阻或已开采天然气无法顺利送入欧洲，才是最符合俄利益的局面

——既能牵制、消耗战略对手，又能确保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份额。因此俄乐见东地中海局势混乱、僵持；甚至不排除会在一方落败时予以平衡，以确保双方“势均力敌”，坐收渔翁之利。

廖百智认为，短期内争端仍将持续，目前出现了一些缓和信号。9月13日，Oruc Reis号返回土耳其，希腊称其为缓解矛盾的积极的第一步，但土说是按计划返航。9月23日，希腊外长称，在经过60轮无果谈判后于2016年中断的土、希谈判可能于“近期”在伊斯坦布尔恢复，但双方都未给出时间表。9月25日，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Nicos Anastasiades）在联大称，愿将全部天然气收入转存到北塞认可的托管账户，但不能在枪口的威胁下重启两族谈判；要求欧盟对土采取更强硬措施，否则将阻止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从长远角度看希土争端，一方面，核心分歧难以解决。土耳其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视为事实上的反土军政同盟，将争夺塞浦路斯周边海域控制权提升到“突破海洋封锁”的国家安全高度，将解决东地中海问题与实现“蓝色家园”（海洋扩张）战略密切联系。阿联酋、埃及把与土耳其的争夺视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尤其是利比亚，主张坚决反对土耳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欧洲担心土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冒险会给利比亚、叙利亚局势带来联动效应，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再生波澜。另一方面，冲突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爆发军事摩擦的风险依然存在。2020年5月，阿联酋与塞浦路斯、希腊、埃及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土地区政策；8月，阿又向处于争议中心的希腊克里特岛部

署战机，参与希腊军演，营造阿拉伯国家与欧洲联手抵制土耳其的态势。9月10日，法国主导地中海七国召开峰会，准备呼吁、支持欧盟对土制裁，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介入争端。11日，英国海军又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联合军演。除争端各方频繁在东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外，法国和俄罗斯均增加了在东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部署和军事行动；希腊斥资数亿美元向美国采购反潜直升机、导航仪、精确制导火箭弹、鱼雷等多种军需用品，并拟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多用途护卫舰等，8月底又向距土仅2公里的卡斯特洛里佐岛非军事区增兵；土耳其则以“常规行动”的名义向土希陆地边境增派40辆坦克。国际社会警告称，东地中海区域军事化程度持续升高，正在成为新的“火药桶”。尽管希土之间爆发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不能排除土耳其军事冒险或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李建军从东西方的视角分析了希腊和土耳其的海上争端。李建军指出，自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海上领土划分谅解备忘录引发希腊强烈抗议以来，东南欧当地媒体开始讨论此次希土海上争端是否会爆发冲突。塞尔维亚政府引用一些希腊报道后，提出“希腊与土耳其处在战争边缘”；保加利亚媒体援引国际分析人士的看法后提出，“北约内部新的对峙有可能对该组织的未来带来‘致命的影响’”。其实关于地中海东部的边界争端既久又深，不过一直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仅限于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主权诉求与反诉，但是近些年该地区的难民问题以及海上天然气资源等问题，把地中海尤其

是东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舞台，新的地缘政治断层线通过这个舞台汇聚在一起。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却在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属于“即东且西”的角色。虽然土耳其自认为是欧洲国家，且在上个世纪就成为了欧盟候选国，但却迟迟不能入盟。有观点认为，土耳其地理位置、威权体制、种族、宗教、历史都属于东方，它不是欧洲，不是西方，它只是在西方需要它时才属于西方。

希腊在历史上曾与东方联系密切，但是现在绝对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巴尔干曾经被奥斯曼占领四五百年，希腊成为人们眼中的近东的一部分，种族由此变得混杂，混入了斯拉夫人的血统，这一点曾被西方人所厌恶。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法尔梅拉耶尔曾经说，“现代希腊基督徒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但是亲希腊的人还是坚信“现代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而土耳其则是野蛮人。”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百分比协议中，巴尔干其它部分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英国认为希腊与这些国家大为不同，在西方的政治宣传中，希腊被塑造成民主的堡垒。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共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希腊守卫的陆海边界都是欧盟的边界。在塞浦路斯、希土冲突、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上，欧盟都义无反顾地支持希腊。

土耳其和希腊在东西方的不同角色，也反映在近期东地中海的争端上。东地中海输油管道项目（East Med，始于2012年）和“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始于2019年）都

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其中意大利埃尼集团（ENI）和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TOTAL）都参与进来，共同开发以色列、塞浦路斯的天然气。由此形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希腊、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埃及、以色列、美国，一方是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因其地理位置因素，一直在积极推进自身的欧亚能源枢纽地位，土外交部一再强调，“通往欧洲最经济、最安全的通道就是经过土耳其”。土方认为，在地中海只由希腊、塞浦路斯、阿拉伯公司以及意大利埃尼和法国道达尔等大国公司参加勘探油气而忽视土耳其，是不可接受的。这些项目和论坛组织完全绕开土耳其，选择与其长期关系不睦的希腊，在削弱土耳其战略地位的同时大幅提高希腊地位，体现的是东西方的对立。这也再次证明了土耳其在被需要的时候是西方，不被需要时就成为了对立面。

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民族主义的复兴，土耳其绝不会满足于被当作西方的“棋子”。土耳其总理艾哈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战略深度》（Strategic Depth）一书出版后，“蓝色家园”概念被普及。按照这个概念，当奥斯曼帝国失去对海洋的控制时，它基本上就崩溃了，土耳其必须重返海洋、重返“蓝色家园”才能恢复势力。2019 年 9 月 2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场会议上展示一张照片，上面的地图描绘了爱琴海近一半地区以及克里特岛东部沿海属于土耳其的地区。这张地图是在伊斯坦布尔国防大学举行的官方仪式上展示的，显示的就是被称为“土耳其蓝色家园”的区域。本着恢复势力、摆脱西方棋子的目的土耳其也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2019 年 11 月 28 日，埃尔多安在伊

斯坦布尔与利比亚民族和解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伊（Fayezal-Sarraj）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谅解备忘录，以划定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地中海东部海域。这个协议为土耳其确定了一个最大的海上区域，剥夺了希腊岛屿的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也由此收获了对海上能源资源的主权。这项协议招致希腊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土耳其在国际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

此外，土耳其还向四周扩张军事活动。它侵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将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土耳其化，军事卷入利比亚（利比亚有 350 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以及向利比亚武装提供武器，对希腊和塞浦路斯推行新奥斯曼主义侵略政策，旨在推翻 1923 年签订的洛桑和约（该和约将爱琴海的诸多岛屿给了希腊）。

在宗教文化方面，土耳其努力捍卫自身地位，对抗西方。2019 年 3 月，埃尔多安提议将拜占庭时代的建筑——圣索菲亚教堂恢复为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清真寺。全世界约 3 亿东正教基督徒的“精神领袖”、伊斯坦布尔牧首巴塞洛缪（Bartolomaious）对此表示，“将圣索菲亚改为清真寺将使全世界数百万基督徒失望”。7 月，土耳其法院废除了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博物馆的法令。对于国际批评，土外长察武索格鲁（M. Cavusoglu）称“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李建军谈到，虽然西方对希腊的支持造成事实上土耳其的孤立，但土耳其“即东且西”的角色会使西方不得不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盟国，它们之间任何武装冲

突都将自动削弱北约的南翼，第三国将伺机而动。希腊的主流政党大体上同意这种观点，对于北约来说，防范俄罗斯才是重点。第二，土耳其在难民/移民流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15 年和 2016 年初，欧洲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土耳其成为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国家。第三，此次希土海上争端掺杂了一些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东西方问题，如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以色列等问题，还有欧盟内部团结、北约“脑死亡”等西方问题，让争端呈现出高度争议性、多层次和国际化，加之疫情使各国和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多，争端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上述考虑使西方对希土争端没有统一立场，表现分裂：希腊、塞浦路斯、法国和奥地利持更加强硬的路线；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持较为温和的路线；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则主张与土耳其保持积极的关系。

李建军对希土对峙进行了总结和展望：第一，希土东地中海对峙，是希腊和土耳其在东西方的角色演变的结果。这与土耳其长期“既东且西”的模糊状态相关，这种状态使其想在区域发挥作用，想恢复实力，也使其陷入与希腊阵营的对立，更使其具备了挑衅“筹码”。第二，虽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土联盟，但土耳其“即东且西”的角色很可能让战争暂时从“一触即发”到“北约绝不允许”。第三，孤立土耳其不可取，土耳其继续挑衅也不可取，明智的做法是采取对话、谈判的方式。第四，只要土耳其“蓝色家园”的梦想不变，土耳其和希腊的争端即使暂时平息，也将持续下去。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廖雪霞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

希土争端。她表示，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了定义沿海国海洋权利范围的主要依据，土耳其并不是此项公约的缔约国，所以从条约角度看土耳其不受该条约的约束。然而，国际习惯法通过国家实践产生，且并不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实践形成过程中。换言之，土耳其虽然没有签署该公约，但只要公约中的条款构成习惯法，土耳其也将受这些规范的拘束。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沿海国权利范围的内容是否适用于土耳其，是判断希腊与土耳其海洋权利边界的根本问题，而两国在这些权利的立场上差异太大，使得爱琴海争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任何拥有海岸的沿海国都可以享有 12 海里的领海、24 海里毗连区、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然而，海洋的范围是有限的，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可能产生大量的权利重叠，从而产生了划定海洋边界的需要。海洋边界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任何一方享有绝对、排他的权利，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依据国际法来主张一定范围的权利。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陆地领土的争端不同，也是评判希土两国海洋争端时明确两国海洋权利范围的基准点。

廖雪霞指出，除领海外，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并不属于主权范围，它只是一国基于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享有的功能性管辖权。因此，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均享有航行自由、铺设海底管道的自由、飞跃的自由等一些具有公海性质的权利，所以海洋权利在不同区域其性质也不一样。

岛屿海洋权利问题也十分关键。《公约》有关岛屿的制度已然成为习惯法。岛屿海洋权利的根本原则是海洋权利依

附于陆地权利，即所谓“陆地支配海洋”。这就意味着岛屿的主权归属于哪国，哪国就可以依据这个岛屿享有海洋权利。岛屿和大陆一样享有海洋权利，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公约》中也有一个限制条款，即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者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换言之，《公约》对于岛屿和岩礁进行了区分，如果海上的一小块陆地被认定是岩礁而不是岛屿，那它将没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即便如此它仍有12海里的领海。显然，如果一个海上地物被认定为岩礁，那么它享有的海洋权利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因此岛礁的性质及其权利范围也是希腊与土耳其争端中很重要的内容。

廖雪霞认为，东地中海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海洋划界问题。虽然区域范围有限，但每个国家按照习惯法都可以主张200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也可以主张12海里的领海，这意味着会产生很多重叠区域，由此带来诸多争端。分析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显然两国划定的临时边界无视了希腊克里特岛的海洋权利，因为按照岛屿权利的基本规则，克里特岛应拥有跟陆地一样的海洋权利。此外，土耳其与利比亚间的谅解备忘录对希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条约不对第三方创设权利或义务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相反，如果土耳其和利比亚在这个区域进行开发活动，比如钻井开采油气等，就会侵害希腊的权利，应当承担违反国际法的责任。今年8月希腊和埃及缔结了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这份协议也涉及到利比亚和土耳其之间签订备忘录的区域，但这一协议对于土耳其和利比亚同样不会产生任何法律上

的效力，即如果希腊在争议海域内从事钻井开发等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和利比亚权利的侵害。

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争端，首先涉及到有关岛屿主权归属的领土争端。此外，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土耳其认为希腊的岛屿只有 3 海里的领海，但希腊主张 12 海里的领海。从领海范围的国际法来看，希腊的主张享有充分的依据，但当希腊的领海与土耳其的领海产生海洋重叠时，两国则需要划定海上边界，这意味着希腊不一定能最终享有 12 海里的领海。

两国之间的另一争议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岛屿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问题。土耳其认为希腊有很多所谓的岛实际是岩礁，若这一主张成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很多权利重叠的海域将消失。而如果这些岛被认定为岛屿，则意味着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存在海洋权利的重叠，需要进行划界。

希土两国关于岛屿权利的另一争端是希腊在爱琴海中的岛屿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张海洋权利，这一问题目前在国际法上尚无定论。从海洋划界的规则看，土耳其海岸线漫长，而希腊岛屿的海岸线整体看较为破碎，岛屿在划界中具备何种效力，尚缺乏通行的规范。

廖雪霞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土耳其对法律解决一直持反对态度。1976 年希腊将两国大陆架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但土耳其并没有参加程序，并且国际法院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另外一种途径是国际组织的介入。除了欧盟，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

安理会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的责任，东地中海的争端其实也是在考验二战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因此，如果联合国大会或者安理会能够发挥作用，也是在践行维护战后国际法秩序的职责。

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颖超指出，希腊和土耳其的争端由来已久。民族纷争、能源争夺、边界争议等多重矛盾复杂交织，迟滞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也有碍地区和平稳定。其中，希土关系和希土民族纷争的核心问题是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和土耳其深入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使之成为东地中海的不稳定因素。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处于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1960年8月，塞浦路斯宣布独立并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地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但塞浦路斯宪法的一些规定却不能同时满足希、土两族的要求。1963年底，希、土两族因制宪问题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1974年7月，希腊独裁政权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岛上土族居民为由，以“保证国”身份出兵塞岛。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联合政府解体。北方希族人南迁并聚居南方，占全国领土的62%，建立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南部土族人北移并控制北方，占全国领土的38%，成立仅土耳其一国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双方在塞岛中部划出一条无人地带，称之为“绿线”，由希、土两族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分段设卡，形成南北分治之势。1998年8月，土族领导人建议在塞浦路斯建立由“两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遭到希族拒绝。200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组成的“共

同国家”政府。2004年4月，希、土两族就安南方案同时举行全民公决，土族以64.91%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该方案，而希族却以75.83%的压倒多数予以否决，此后两族间多轮谈判均无果而终，导致塞浦路斯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近年来，希腊与塞浦路斯对外立场基本一致，特别在涉及土耳其及东地中海区域问题上统一发声，形成联动。而土耳其则彻底站在“北塞”一边，并且持续将土耳其移民送往“北塞”，引发塞浦路斯强烈不满。

此外，希腊和土耳其围绕东地中海油气开发的冲突日趋加剧。今年8月中旬，两国军舰因油气勘探而对峙相撞，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双方矛盾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希腊认为塞浦路斯有权按国际法界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并有权在其经济区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而土耳其认为“北塞”土族人对是否开采油气及建通气管道同样有决定权，且有权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塞浦路斯不能罔顾“北塞”土族的意见而擅自开发。

钱颖超认为，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希腊的立场和策略是明确的，即坚决维护塞浦路斯和自身的利益，依托欧盟并积极拉拢一些大国为其发声，向土耳其施压；对土喊话异常强硬，但处理相关具体事务又比较灵活，留有余地。希腊采取这种政策，一是近年来受债务危机影响，其经济大幅下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可能放弃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和打造能源通道的机会。二是因为希腊军事实力无法直接与土耳其抗衡，尽量避免与土直接起军事冲突，同时依托欧盟向土施压；三是希腊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对话解决

两国争端，因此在强硬喊话之后，仍留有外交渠道进行双边沟通。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近期以来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现也较为高调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土奉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二是土自身能源匮乏，东地中海能源问题涉及其切身利益；三是希、塞、以三国协议影响土打造自身地区能源走廊计划；四是土执政党正发党目前在国内执政堪忧，出现诸多问题，急需外交成绩提升民意。五是土手握“难民牌”，预计欧盟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不会一味向其施压，而是会适当让步，因此表现强硬。不过，土耳其并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与希腊保持着“既打又谈”的状态。

钱颖超认为，希土矛盾发展至今，已悄然演变成地缘战略博弈。美国、欧盟、中东和北非等地缘政治力量在东地中海聚合，共同兴风作浪。关于俄罗斯此次没有过多插手东地中海能源事务的原因。一方面，俄罗斯和塞浦路斯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塞浦路斯是俄众多巨头和企业通往欧盟的跳板，也是其“避税天堂”，利益纽带连接紧密。另一方面，希、塞、以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影响到俄土共同打造地区能源走廊计划，触及了俄的地区利益。因此，俄罗斯在该问题上进退两难。此外，东地中海区域事务目前也非俄罗斯首要关注的问题。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艾琳娜（Elena AVRAMIDOU）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演变。她认为，希土关系的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二战结束，此时土耳其作为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与希腊开展正常交往。第

二阶段是二战结束后，塞浦路斯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因素。1974 年塞浦路斯内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分别于 1978 年、1996 年发生过较大摩擦，都发生在爱琴海地区。最近，在地中海东部发现气田之后，土耳其在争议海域开展油气资源勘探，导致希土两国紧张关系升级，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艾琳娜认为，希土之间的油气争端，既是眼下的能源利益之争，也与两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冲突记忆密切相关。艾琳娜回顾了 20 世纪塞浦路斯岛土族、希族矛盾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希土的合作与分歧。艾琳娜指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障碍。

艾琳娜介绍了希土两国关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的分歧。爱琴海、东地中海岛屿有三种类型，希土两国的陆地与岛屿交错分布、位置甚近，12 海里领海的国际惯例在很多场景不再适用，诉诸国际法和国际法庭或许是调解分歧的方式。她指出，地中海油气涉及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约旦、美国、阿联酋等多国利益，欧盟和北约两大国际组织也介入其中。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强硬外交政策使其与希腊的关系更加紧张，局势更加复杂。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指出，19 世纪对于整个巴尔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生成的世纪。现在所知的巴尔干主要民族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是在这个世纪生成的，希土因塞浦路斯产生的种种争端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

19 世纪希腊的历史以希腊王国即现代希腊国家（1830

年代)的诞生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对 19 世纪中后期希腊历史的解读还是要从希腊王国建成前的这 30 年开始,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启蒙运动”(Greek Enlightenment)的中后期,对现代希腊国家具有奠基意义。希腊启蒙运动是希腊人开始系统学习并引介西方思想的时期,也是现代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西欧思想中对希腊民族认同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思潮,是“希腊主义”及其派生物“亲希腊主义”。“希腊主义”实际上是当时西方人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欧文明之源是其他古代文明无可企及的人类文明之巅。西欧人把对古希腊的崇拜移情到对现代希腊人的悲悯上,由此产生了“亲希腊主义”。现在希腊人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之下,他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先祖去争取民族自由。当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些希腊知识精英,将西方人对古希腊人的崇拜和古今希腊人的直接继承关系完全移植过来,并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希腊主义”和“亲希腊主义”相平行的是流行于当时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对应和对立关系:即认为现在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接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是古代波斯人的直接后裔,希腊代表民主、自由、文明,波斯(奥斯曼)代表专制、奴役、野蛮。1821 年希腊《独立宣言》就很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对立和对应关系,当时的希腊人其实就是将独立战争想象成了一场希波战争的复活战。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可以说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希腊主流的历史书写,教材编写更是忠实地遵守了这一模式。

19 世纪中、后期主宰希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伟大理想”

(Megali idea)。简言之就是解放并统一那些希腊王国之外的希腊人与希腊人聚集地，重拾拜占廷帝国的荣光。而希腊实现“伟大理想”，实现民族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它的北方邻居，一个是斯拉夫，另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希腊王国建成之后，民众心中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肖像”，在其基础教育（中、小学）的地理课本中类似民族志（ethnography）部分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一些发现。这些课本中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使用最高频的修饰语仍是那个古老的希腊词汇“野蛮”（βάρβαρος）。不过，这里的“野蛮”并不是在控诉土耳其人统治手段的残忍，更多的是对他们文化状况的描述：土耳其人在文化上很落后，尤其落后于西方国家。至于奥斯曼土耳其为什么会这么落后，这些教科书编写者一般会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阻碍了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存在缺陷，专制统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与贬低、蔑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人的自我拔高与极度自信，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希腊人认为他们“远胜于”巴尔干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整个 19 世纪，希腊教课书中都满溢着鲜明的“希腊中心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写作篇幅上，即便是在类似于世界通史、世界地理之类的教材中，对于关涉希腊的部分都要大书特书，其他国家多是一笔代过。并且教科书编写者很乐于将希腊人与周边民族做比较，通常是对希腊人扬长避短、大加赞美，对其他民族尤其跟希腊有竞争关系的民族，比如土耳其人和 19 世纪后期的新竞争对手保加利亚人则尽可能地暴露他们的民族缺陷。

这种“希腊中心主义”的写作模式虽然在激发爱国情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方面作用明显，但它也制造出一种虚高和虚假的民族自信，同时对自己和邻国的实际国力产生误判。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浸润和熏陶之下产生的公众舆论，反过来对希腊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最惨痛的例子就是 1897 年执政党迫于民众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双方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越过宪法，仓促发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最终惨败。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龚颖元以近一个月来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以下简称“阿通社”）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土耳其政府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以及如何将其行为合理化的具体路径，阐述了以下四点：

第一，8 月以来，阿通社以高频次、强聚焦、多引证的方式报道了东地中海局势。特别是 9 月中旬以来，阿通社多次报道了土耳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动向。虽然土耳其积极寻求舆论支持，但至今未能获得理想的结果。9 月 22 日，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土耳其对他国合法利益没有企图，反响平平；阿通社则连日报道了土耳其领导人与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元首和政要就东地中海问题举行的电话会晤。有意思的是，此类报道只传达了土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的立场，却没有外国领导人的任何表态，颇有些“自导自演，顾影自怜”的意味。

第二，从行为合理化角度看，土耳其一直强调其作为该区域海岸线最长的国家，理应享有更多大陆架资源等海洋资

源的主张。但根据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土耳其在主张海权方面并不占优，能争取到多大的海权取决于和相关方斡旋的结果。

第三，九月中旬以来，尽管土耳其方面多次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始终对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两点主张”态度坚决、语气强硬。首先，土方要求希腊尊重国际海洋法，放弃西班牙人绘制的塞维利亚地图（Sevilla Haritasi）；其次，土耳其强调塞浦路斯北方土族的利益受损在先，主张塞浦路斯希族必须尊重北方土族的利益。

第四，伴随着东地中海局势升温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议题，是对黑海油气田的报道。然而实际上，黑海油气田问题是三四年前的旧话题，从新闻报道价值上看并无亮点，此时旧事重提，并通过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的口径，传达“2025年后黑海天然气的探测可满足土耳其国内30%的能源需求”、“黑海萨卡里亚的第一批开发生产将于2023年完成，该油气田将在2024-2025年实现稳定生产”的讯息，不排除是出于安抚不断被激化的国内矛盾和民族情绪的需要。

总体而言，阿通社通过较丰富的国内和国外转引源，试图塑造一个积极争取舆论声援的政府形象。但无论是大声疾呼“两点主张”，还是旧事重提老生常谈，都突出地反映了土耳其政府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现状。在国际力量的干预下，东地中海问题最终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从历史经验来看，东地中海问题很难在没有西方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问题早已超越了土耳其与希腊之争的边

界，最终的解决路径将建立在多方利益再分配的基础之上。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咎涛**副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长期以来，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宗教信仰差异、领土争端和塞浦路斯问题始终是造成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尽管希土问题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但考虑到地中海区域在世界历史的特殊重要性，这个议题必将会引导我们对不同的历史观念、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地中海区域的帝国遗产与地缘政治、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的纠结、重大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不断思考。